

•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男权文化阐释

——兼及对女权主义的启示

施文斐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 从意识形态(阳具崇拜)到思维逻辑(从生殖力的父性归属推导出性别权力的男性归属),再到男权制的两大保障机制(“乱伦禁忌”与“族外通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可以说内置了一整套完整的男权文化系统。男权立场的预设使得古老的男权文化在生理解剖学—临床心理学的科学外衣下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复活,同时又由其必然导致的反女权主义倾向不可避免地使得弗洛伊德学说成为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矛头所指。但论证思路的错误并不能诋毁科学研究本身的认识价值,弗洛伊德的许多富于创造性、革命性的临床发现对于女权主义自身的理论反思乃至今后的理论发展走向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辩证的科学态度将有助于对弗洛伊德学说的重新审视与重新发现。

关键词: 阳具妒嫉说; 性别权力; 阉割情结; 乱伦禁忌; 社会性别; 男权制社会; 社会建构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7)06-0006-09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的第二波浪潮对探讨妇女从属地位的制度性根源——“男权制”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论热情。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1970)、盖尔·鲁宾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1975)等皆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成果。在这些女权主义的代表性著作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与批判,其中,又尤以凯特·米利特的批驳最为系统、抨击最为猛烈、措词最为严厉。米利特认为弗洛伊德“作为个人,他无疑是最强大的反动分子”^{[1](P272)},他的精神分析学说是“毫不

含糊的主观和臆断”^{[1](P279)}的“科学黑话”^{[1](P312)},充斥着大量的“男性偏见”^{[1](P279)}和“厌女情绪的推断”^{[1](P279)},“他有关妇女的说法中也不时夹杂有对女权主义观点的刺耳的言词”^{[1](P288)},“反女权主义的本性”“千真万确地体现在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中”^{[1](P272)}。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否真的如女权主义者批判的那样具有反女权主义倾向? 他的理论阐释究竟内含了怎样的性别立场? 其学说是否根本反动而对女权主义运动全无一点借鉴与启示? 将弗洛伊德学说置放于男权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重新审视,将有助于我们探究到其中一些重要观点

收稿日期: 2017-08-20

基金项目: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资助项目“性别书写与近世白话小说”(项目编号: 2014YB11)

作者简介: 施文斐(1978—),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近世小说与性别研究。

形成的原始根源与古老逻辑,明确其学说在整个男权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在将男权意识的解读与真正的科学论断加以充分剥离的基础上,辩证地看待弗洛伊德学说中一些富有创建性、革命性的真知灼见,从而为女权主义自身的理论反思乃至今后的理论发展走向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

一、关于“阳具妒羡说”:“势”与菲勒斯中心主义

“阳具妒羡说”是弗洛伊德女性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弗洛伊德对“阳具妒羡说”在解读女性人格心理发展时发挥的作用极为自信,“如果你们将我关于缺少阴茎的事实,在女性人格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的信仰视为成见的话,我自然无话可说了”^{[1] (P275)}。的确,在弗洛伊德版的女性人格心理学中,被动的女性属性、异性恋的性取向、对生育母职的体认等皆可从“阳具妒羡说”中寻找找到原初的心理动机,这一心理动机的产生又无疑根源于“阳具缺失”这一生物学“事实”。尽管弗洛伊德有时也会提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但终究还是认为,“在心理研究的领域内,生物的因素确实确实是根本”^{[1] (P289)},他的女性心理分析也因此倒向了生物决定论,而且还是菲勒斯(阳具)中心主义的生物决定论,这就决定了他的女性人格心理学必然是否定论调的:由于阳具的缺失,坚信自己遭到了阉割的小女孩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性别自卑,丧失了曾经的“雄心”而转向被动与自虐;同样还是由于阳具的缺失,深感性别低劣的她终其一生都无法放弃对阳具的热切追求,无论结婚生子,还是成就事业,其一切行为都根源于“阳具渴望”这一深层心理动机。尤其对于那些女权主义者而言,她们未能适时地将对阳具的渴望转化为对生育与男人的渴望,拒绝接受自己的社会性别身份而妄想像男人那样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将一项耗费智力的职业坚持下去的毅力”不过是“获得男性属性的企图在无意识中持续下去”,是渴望获得阳具“这一被压抑的希望之变体”^{[1] (P301)}。这些因成长受挫而未能进入预定轨道的女性显然需要作为神经疾病患者接受治疗,治疗的最终目的就是

要让他们认清现实、接受定位,从企图变成男人的病态幻想中回归到为社会性别规范所认可的母职与妻性上。显然,弗洛伊德的女性人格心理学里隐含着对女权主义者的强烈否定,依据这一学说,女权主义者无异于患上了阳具妒羡症的精神疾病患者,都是一些需要接受精神治疗的“男性变态”^{[1] (P285)}。可想而知,这一不亚于人身攻击的“科学”论断会在女权主义者当中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米利特即认为“在性的反动时期,在削弱和摧毁女权主义起义的企图,除了挖苦和愚弄,还没有一种武器比弗洛伊德的阴茎妒嫉说更具威力。”^{[1] (P291)}

但这一令女权主义者愤恨不已的“阳具妒羡说”其实也不完全是弗洛伊德的闭门独造,而是清晰地刻印着阳具崇拜意识的原始痕迹。据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提供的材料可知,原始人普遍认为女性外生殖器的“现状”是由于遭遇了鸟或蛇的袭击而导致的外伤所致。由于遭到了这一形同阉割的损伤,所以她们的“伤口”处经常流血不止,而流血,亦即月经则被视为上天对女人的惩罚,至今在英文俚语中,月经还被称为“the curse”(天罚),来月经被称为“to have the curse”(遭到了天罚)。原始信仰中以男性器官为标准反观女性,将女性月经以及导致月经的所谓“被阉割”视为惩罚之类的观念在弗洛伊德的“阳具妒羡说”中均有印证。弗洛伊德关于两性器官优劣对比的许多表述,如“男孩远为优越的装备”“远为优越的对应物”“她低劣的阴蒂”“生殖器的缺陷”“固有的性低劣”^{[1] (P275)}等也同样是通过对贬损女性器官以凸显阳具优越的阳具崇拜意识的体现。弗洛伊德的“阳具妒羡说”使得阳具崇拜这一古老的意识形态在临床心理学的科学外衣下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复活。

作为一种古老的意识形态,潜藏在弗洛伊德学说中的阳具崇拜意识决定了并不能对其学说中大量出现的“阳具”字眼仅作字面上的理解。法国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康指出,弗洛伊德的学说是“有关信息而不是有关器官的理论”^{[2] (P50)},所谓“阳具缺失”的生物学事实显然并不是什么“事实”,“因为那事实(女人的性器

官)是完整的,并不‘缺乏’任何东西”,那种所谓的“被阉割感”“从来不是真实的而是象征的”^{[2] [P53]},“弗洛伊德决不是想谈论有关生理构造方面的问题,弗洛伊德理论实际上是关于强加在生理结构上的语言和文化意义。”^{[1] [P50]}为了更好地突出阳具的象征意义,拉康用“势”“阳具”对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性与物质性作了区分。女权主义者鲁宾接受了拉康的观点,并从“势”的象征意义出发对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描述的亲属关系结构作了重新解读,指出女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婚姻契约的签约方,而只能作为“礼物”被动地在两群男人之间流通,其原因就在于生理性别上的女性并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阳具所象征的天然性别权力(“势”)。在由婚姻契约结成的男人社会关系网络中,永远都是“女人朝一个方向走,‘势’朝另一个方向”,“‘势’和女人永远不在同一处出现”^{[1] [P54]}。

将一性之于另一性的性别权力赋予只为男性所独有的器官,事实上也就等于认可了男性对性别权力的独占与垄断。据《圣经·旧约·创世记》(17:9—17:14)记载,耶和華在与亚伯拉罕立约时需要一个特殊的男性符号作为立约的证据,这一男性符号被最终选定为“受割礼”。耶和華表示“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圣经·旧约·创世记》17:11)^{[3] [P28]}“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永远的约。”(《圣经·旧约·创世记》17:13)^{[3] [P28]}作为立约的标记,割礼象征着“已成为立约群体一员的标志”,是对“选民意识”的一种“提醒”^{[1] [P28]}。格尔达·勒纳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如果必须要用身体上的标记把上帝的选民区分开来的话,那么,为什么就非要用这种标记呢?然而,也恰恰就是这一“标记”才能“确保”女人无法参与立约,从而保障了签约的权力以及由契约生成的各项权益只能为男人所独享。从这一意义而言,“势”是“男人权力的符号性再现”^{[4] [P140]},是“传播男性统治的一种表述”^{[1] [P54]},男性统治正是建立在“势”的隐喻意味上的“阳具统治”。从这一层面来看,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反女权主义倾向也只不过是问题的表面,因为菲勒斯中心主义所秉持的

二元对立思维必然会导致一性对另一性的压制,男性的性别优势唯有在对女性性别的贬损中才能获得体现,对女性器官的贬低、厌女情绪、反女权色彩不过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二、关于“力比多”:生殖力与性别权力的归属问题

男权立场的预设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弗洛伊德的临床分析。尽管由临床观察与实验获得的原始材料无疑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但先入为主的男权立场却阻碍了这些数据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解读。譬如“力比多”的属性问题。尽管弗洛伊德承认力比多为两性所共有,但还是坚持认为力比多是男性属性的。无论它体现在男人身上还是女人身上,也无论它指向男人还是女人,力比多都只是“一种有规律的、合法的男性属性”^{[1] [P295]},“在男性和女性身上的表现形式都是一样的,都是男性的。”^{[5] [P94]}为什么一定要将这种生存必备能力,或者说“物种能力”“生活力量”看作是“男子气”^{[4] [P126]}的呢?这一令人困惑的论断只能从男权立场上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简而言之,力比多之所以必须被赋予男性属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保障生殖力能为男人所绝对垄断,这一点对于男权乃至男权制的确立与维护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依据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丰沛的力比多使得男性拥有更为强大的性能量、性能力,他们更关心子嗣的繁衍,对生育活动也负有更大的责任,而力比多微弱的女性则只是充当被动的“容器”,“生物目标的实现,完全被交付给了男性的主动精神,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女性的合作毫无关系”^{[1] [P296]}。对男性生殖力的推崇与对女性生殖力的剥夺是同时发生的,男性在生育过程中的绝对主导地位由此得到了确认。将“力比多”的男性属性问题与“阳具妒嫉说”体现的阳具崇拜意识置放于男权文化背景下加以综合考察就会发现,对生殖器官的推崇(或贬损)与对生殖力的推崇(或贬损)实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共同指向的正是性别权力的归属问题。性别权力天然根源于生殖力,这是一个极其古老的性别政治命题。生殖器官是生殖力的物质体现,对生殖

器官的褒贬实为对生殖力的褒贬;生殖力又是性别权力的天然来源,生殖力的归属直接关系着性别权力的归属,围绕着生殖力的归属问题所引爆的正是父权与母权之间的权力争夺。

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关于男权制的第二次论争即以原始社会中究竟行使的是父权还是母权为论争的焦点。母亲的生殖力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母亲既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又是一个社会的事实”^{[6] (P35)},婴儿从母体中直接出来的生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母亲的生殖力,并进而宣示了母亲对婴儿的天然控制权。但男人则不同,“一定的时间差距把性交行为与生孩子的行为隔离开来”^{[6] (P35)},除非能得到“母亲的证词”^{[1] (P46)}的支持,否则父亲的身份将无法获得确认。因此,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家霍布斯坚信,母权是“在自然状态下”唯一存在的“政治权力形式”^{[1] (P46)}。具有女权主义色彩的精神分析学者克伦·霍尼据此认为,相较于所谓的“阳具妒嫉说”,更具初始性的恐怕应该是“子宫妒嫉说”才对,并认为男人在公共领域中的一切事功追求都根源于“对女人在私人领域的权力的嫉妒:生育和哺育人类生命的能力,以及对不懂事的孩子行使无限权力的能力”^{[4] (P136)}。可以想见,一旦有关父亲生殖力的相关知识被发现后,长久以来积郁着的子宫妒嫉心理必将引发一场夺权大战:对生殖力的争夺,对父亲身份的确认,进而对男性权力(父权、夫权)的申明与宣示。因此说,相较于母权的“自然事实”,父权“仅仅只是一个社会事实,一项人类的发明”^{[6] (P34)},为父权,以及包括父权在内的男性权力提供制度性保障的男权制,则是“男人克服父亲身份的不确定性需要的一种结果”^{[6] (P34)},体现了由于“男人在人类再生产方式中被异化”而渴望“超越这种异化的欲望”^[7]。

以生殖力的父性归属为父权确认的关键,这一极为古老的父权(制)逻辑思维广泛地体现在父权文化系统的神话与宗教之中。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三部曲《奥瑞斯特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报仇神》的第四场所展现的就是母权之于父权的最后一次悲剧性反击。围绕着俄瑞斯忒斯的弑母罪名是否成立的问题,一场论辩在复仇女神

与新兴的男神阿波罗之间展开。俄瑞斯忒斯的质疑,“我与我这个母亲是同一血缘?”^{[8] (P488)}令复仇女神极为震怒,“腰带里怎么生出了你这个杀人犯?竟然诅咒最亲近的母系血缘?”^{[8] (P488)}男神阿波罗的父性生殖力理论成功地扭转了局面,“并不是被称为母亲的人生儿女,她只不过是抚育新播下的种子,是授胎者生育,母亲如主人与宾客,保护幼芽,若神明不伤害他们,……父亲没有母亲也能生育。”^{[8] (P491)}阿波罗举出的“证人”,那位以成人状态从父亲宙斯的脑袋里直接蹦出来的雅典娜更是提供了关键性的“证词”,表示“她并非在母胎的黑暗里孕育”^{[8] (P491)}。至此,母权因生殖力的被剥夺而宣告了彻底的失败。

这场围绕着生殖力的归属问题展开的性别权力大战也同样在《圣经·旧约·创世纪》中关于夏娃诞生的故事中残留下了模糊的印记。米利特认为,夏娃身上“一定存有退化了的,以往被推翻的生育女神的痕迹”^{[1] (P79-P80)},因为夏娃被认为是“众生之母”^{[3] (P12)},亦即“万种生物的母亲”^{[1] (P80)}。然而,这样一位曾经的原始母神却在男权系统的解读下变成了亚当身体的一部分。神赋予亚当以身体(地上的尘土)并赐名,亚当再赋予夏娃以身体(身上的肋骨)并赐名,亚当因此成为了夏娃的“直接”造物主。从这一意义而言,亚当是夏娃的丈夫,更是夏娃的父亲,原始母神的生殖力为男性所剥夺并占有。《圣经》的这段故事曲折地反映了母权被父权战胜的“前夜”(Eve),而“巧合”的是,“Eve”正是夏娃——这位曾经的生育女神的名字。

生殖力的父性属性也同样体现在17世纪的古典父权主义论调中。“单生观是古典男权主义的核心”^{[6] (P36)},父亲的生殖力从来都被认为是自在圆满的,其本身就是将女性力量与男性力量融汇合一的完美整体。女人在生育活动中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存在,“女人不过是男人实践其性与生殖权力的空洞的管道”,而男人才是“更高贵的主要动因”^{[6] (P93)}。这一父权主义论调与上文论及的弗洛伊德的观点,即力比多微弱的女性只是充当被动的“容器”,“生物目标的实现,完全被交付给了男性的主动精神,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与女性的合作毫无关系”^{[1] (P296)} 可谓如出一辙。更为重要的是,对父亲生殖力的确认并不仅仅关系到父权,更直接关系到父权制的合法性,因为父权往往被认为与君权(政治权力)同源一体。17世纪英国父权制宪政理论的代表人物菲尔默·罗伯特爵士即认为,政治权力(君权)来源于父权,父权则来源于父亲的生殖力,亦即父亲因生育子女而对子女天然享有的权力。显然,如果母亲的生殖力得到了认可,那么不仅是父权,建立于父权之上的君权的合法性都将遭到质疑,父权制宪政体制的理论基石将随之崩溃。因此,生育力只能为父亲所独有。至此,关于生殖力的归属,已经不仅止于性别权力的争夺,而实实在在地演变成了政治问题。

由上述分析可知,通过生殖力的父性归属以确认男性的性别权力一直以来就是典型的父权(制)逻辑思维。弗洛伊德坚持认定“力比多”具有男性属性,无疑为生殖力的父性归属提供了生理解剖学上的“科学”支持。尽管激烈的社会变革往往会引发上层建筑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但“男权制”——这一造就了两性间统治与隶属关系的社会化机制却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一旦它获得了新的维护,一旦它被新的势力认可,一旦有人为它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新的依据,它就会再一次被调动起来”^{[1] (P270)},而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正是以一副“对社会进行控制和操纵的最有用、最权威的”^{[1] (P271)}“科学”面目成功地担负起了这一重任。

三、关于“阉割情结”与“乱伦禁忌”:社会性别的建构与男权制社会的再生产

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多态性异常”是弗洛伊德儿童性心理学中一个极具价值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身处这一阶段的儿童基本上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他的性感区可以面向广泛的性对象无差别地开放,这其中就包括他的父母血亲。“儿童可以出现多重性变态,可以被引入各种各样的性反常现象”,他们“先天就存在着这些倾向”^[9]。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多态性异常”首先体现为将原欲对象指向自己母亲的乱伦情结,且这一乱伦情结对女孩而言更多了一层同性恋意味,因此,弗洛伊德认

为,相较于始终保持着异性恋取向的男孩,“女孩向正常妇女的发展”要更为“艰难而复杂”^{[5] (P121)}。幼童如何克服本能的多态性异常而建构起符合社会性别规范的性别身份?尤其对于女孩来说,她“是如何从对母亲的依恋转向对父亲的依恋的?”又是“怎样命中注定地从男性阶段转向女性阶段的?”^{[5] (P123)}弗洛伊德的“阉割情结说”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解释。

弗洛伊德认为,男女两性都有阉割情结,只是内容不同。对于女孩而言,阉割情结更多地体现为“阳具妒羡”心理。由于发现自己“缺失”阳具,原本敢于将母亲视为原欲对象的“小男人”丧失了曾经的“雄心”,而不得不以一种被动的姿态将自己的欲望所指转向父亲,并进而由被动转为自虐,从最初自认为遭到了阉割的沮丧转变为“我想要被我的父亲阉割”^{[2] (P59)}。曾经的“小男人”于是逐渐培养出了被动的、自虐的女性属性,并适时地学会了将“那种不完全适合女性的占有阴茎的欲望,正常地转变成了对婴儿的欲望,继而又转变成对作为阴茎持有者和婴儿给予者——男人的欲望”^{[5] (P103-P104)},最终成功地转变为热衷于母职与妻性的“成熟的女人”。对于男孩而言,阉割情结则更多地体现为“阉割恐惧”心理,尤其是在看到了眼前就有一个“被阉割者”的活生生的例子后,更加剧了小男孩对父亲发出的阉割威胁的恐慌,促使他最终斩断了指向母亲的乱伦情愫,为日后于血缘亲属之外寻找性对象,建立起非血缘的社会关系网络作好心理准备。同时作为对儿子的“奖励”,父亲撤销了阉割威胁,并认可了儿子具有“势”所象征着的性别权力,其日后要求获得一个女人以维护自身性权力的主动性因此得到了保障。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阉割情结说”主要阐明的是男女幼童必将克服多态性异常以建立起社会性别身份的一整套心理机制,且由于这一整套心理机制建立在“阳具的有无”这一先天生理差异上,也就决定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必然性关联,即小男孩必将发展为具有男性气质的男人,而小女孩则必将发展为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否则,“任何偏离固有规范的情形,都可被视为某种程度的病

态。”^{[1] [P294]}“阉割情结说”的运用是弗洛伊德的社会性别理论得以构建成功的关键所在。

这一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生物决定论论调自诞生之日起就毫无悬念地成为女权主义者的矛头所指,所谓的“阉割情结”乍看一下也确实颇有些匪夷所思的荒诞色彩。不过如果将其置放于整个男权文化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这一理论的提出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更非故意地标新立异,而是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切实发挥了维护男权制社会的现实作用。首先,由“阉割情结”促成的男女两性的人格心理发展趋向非常符合男权制社会的空间运作需求。正如上文分析所示,“阉割情结”作为心理机制虽有助于男女幼童克服多态性异常以实现性别的社会化,但其于男女幼童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就男童而言,阉割情结主要表现为阉割恐惧心理,其作用是使男孩摒弃乱伦倾向以确保其日后能与非血缘的女性建立起婚姻关系,并借此建立和拓展非血缘的社会关系网络,其所指向的是社会公共领域;而对于女童来说,阉割情结则更多地表现为阳具妒羡心理,其作用除了斩断指向母亲的乱伦幻想外,更集中体现在迫使女孩形成被动的、自虐的女性属性,以及将母职与妻性作为自身价值体现的性别身份体认,其所指向的是家内私人空间。由“阉割情结”促成的两性人格发展的不同趋向为男权制社会公、私领域的区分与维系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

此外,尚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多态性异常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在“阉割情结”的干预下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但唯有“非乱伦的异性恋”获得了认可并得以发展。这一社会性别规范的制定究竟所据为何?结合弗洛伊德的“阉割情结说”将会发现,除了人格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外,该理论事实上还论及了男权制社会再生产的两大保障机制,即“乱伦禁忌”,以及由乱伦禁忌必然导致的于血亲之外寻找性对象的“族外通婚”,“非乱伦的异性恋”这一性取向上的规制显然与这两大机制极为合拍,其共同确保的正是男权制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对“阉割情结说”的阐释并不能仅仅停留在社会性别,或人格心理

的建构本身,其所关涉的更是男权制社会的保障机制问题。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对“乱伦禁忌”与“族外通婚”在男权制社会的建立与维护中发挥的体制性保障作用进行了论述。弗洛伊德认为男权制社会是在原始父亲实施的绝对父权统治被众儿子们推翻后才建立起来的。弗洛伊德借助精神分析法对众儿子们对父亲既敬又畏、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亦即父亲情结的矛盾情感进行了精彩的剖析。依据弗洛伊德的解释,残暴的原始父亲所代表的绝对父权统治之所以被众儿子们联合推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占有欲异常旺盛的父亲霸占了氏族内的所有女人,对于儿子们来说,“父亲是他们在权力欲和性欲上的巨大障碍”^{[10] [P137]}。因此,当绝对父权统治被推翻后,兄弟们便达成契约以反对权力独裁,确保权力共享。弗洛伊德认为在兄弟们签署的这份原始契约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禁止乱伦”。由于信奉着同一图腾的氏族成员“相信自己有着同一血缘,是同一祖先的后裔”^{[10] [P101]},这一条约的规定迫使兄弟们不得不到氏族外去寻找女人,将血亲排除在性对象之外的“族外通婚”由此得到了确立。族外通婚的实施不仅确保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兄弟同盟不会因对族内女人的混乱争抢而分崩离析,同时亦确保了每个兄弟都能通过有序的族外通婚获得一个女人的性权力。男性权力得到了保障,兄弟同盟得以存续下去,权力垄断的绝对父权统治终于为权力共享的男权制社会所取代。

弗洛伊德的关于通过“乱伦禁忌”与“族外通婚”的保障机制以确保男人性权力的观点,在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结构研究中得到了回应,列维更进而将婚姻契约的缔结描述为以女人这一“最珍贵的礼物”^{[2] [P36]}为媒介而在两群男人之间结成非血缘的社会关系网络。女权主义者盖尔·鲁宾接受了列维的观点,并认为列维描述的亲属关系结构深刻地揭示了“女人在其中对自身缺乏完整权利的一种制度”^{[2] [P40]},洞悉了男权制这一女人受压迫的从属地位形成的制度性根源。然而,列维以及接受了列维理论

的鲁宾尚仅仅停留在“乱伦禁忌”与“族外通婚”这一男权制社会得以形成的结构机制上,而未能有效地解释在婚姻契约中体现出的性别的稳定性,即男人永远都是签约者、赐礼者、流通过程的组织者,而女人却永远只能充作被动流通的“礼物”。性别稳定性的存在表明了男女两性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的角色绝不可能仅仅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必然有着更为恒定、稳固的生物学基础,“必须着眼于生物性或解剖学意义上的差异,否则从逻辑上它就无法解释性别稳定性”^{[4] (P155)}。弗洛伊德的社会性别理论即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在通过婚姻契约结成的亲属关系中,男人作为签约者的主动性,女人作为“礼物”的被动性,男人借助姻亲纽带以向社会公共领域拓展的向外趋向,女人作为被交换回来的“礼物”而不得不固守于家内私人空间的向内趋向,都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社会性别理论中找到人格心理层面的解释,且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男女两性不同的人格心理又恰恰建立在“阳具的有无”这一先天存在、不可更改的生物学差异性上。从这一意义而言,作为社会性别形成的重要心理机制——“阉割情结”虽饱受女权主义者的质疑,但毕竟还是在客观上为更进一步地深入探讨妇女从属地位形成的心理学根源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这相较于女权主义者仅仅停留于体制结构层面上的探讨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进步。

四、关于“社会建构”与“无意识”: 弗洛伊德思想对女权主义的启示

从意识形态到思维逻辑,再到制度化保障机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可以说内置了一整套完整的男权文化系统,并在借助人格心理学与社会性别理论为男权制建构的合法性提供心理依据的同时,亦使得古老的男权文化在生理解剖学—临床心理学的科学外衣下得到了新的维护。女权主义者米利特认为,在解释女性的性别自卑时,弗洛伊德并没有将“男权制的社会环境以及女性在这一社会的低下地位”这些社会性因素考虑进来,而完全将“基于解剖学上的差异这一生物学的事实”的孩童体验当成了解释一切的原因^{[1] (P276)}。然而结合上文论述将会发现,这种

看似纯粹的科学面孔不过是一个假象,男权文化的价值观早已深深地渗透进了弗洛伊德的整个理论构想中,并使其针对临床观察资料所作的分析常常在男权立场的预设下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弗洛伊德学说时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科学态度,将那些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临床发现与为男权意识所左右的倾向性解读充分地剥离开来。论证思路的错误并不能诋毁作为论证对象的原始资料本身的认识价值,在剔除了男权立场的干扰后,我们将会发现,弗洛伊德的许多富于创建性的临床发现对于女权主义而言同样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多态性异常的存在表明了性别本身是一个社会化过程,主动性的男性气质、被动性的女性气质、“非乱伦的异性恋”取向,乃至生育母职的所谓女人“天性”都只是后天建构的结果。更具革命意义的是,多态性异常的存在还极具颠覆性地暗示了在原始(“自然”)的混乱状态与后天(“社会”)的理性建构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联系,闪耀着人类理性之光的秩序与规范恰恰植根于原始状态的混沌与无序中,究竟何者为正常的、规范的,何者又为反常的、病态的,都只不过是一种选择的结果,性别的社会建构本身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人类自认为纯粹的理性判断往往都有着混沌不清的原始基础,追溯得越久远,就越会发现我们所认定的现代性,往往都有着古老的心理根基;我们所标榜的社会建构,往往都有着植根于人类潜意识中的深层动因,并非完全是清醒的、理性的选择。正如“禁忌”与“欲望”的永恒较量所显示的那样,“禁忌的强度及其强迫特性完全要归因于潜意识对抗,归因于那种隐蔽了的、丝毫未衰的欲望”^{[10] (P34)},理性未必是唯一真实的原因,未必有理由阻止我们向心灵的更深处去探求那些隐匿在无意识中的真正动因,纯然理性的社会建构不过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幻觉。弗洛伊德学说的“无意识”理论揭示了多态性异常的绝对自由本性,对社会建构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是女权主义者所无法接受的。

女权主义者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猛烈抨击几乎全部集中到了具有鲜明男权立场的“阳具妒羨

说“阉割情结”等理论上,此类明显根源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学说也确实有问题。但论证逻辑上的错误并不意味着观点本身的全盘错误,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毕竟还是有一定关联的,社会性别的生物学基础终究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已有研究表明,月经、怀孕、分娩、生育等生物学事实确实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活动空间,在节育、避孕技术都十分匮乏的时代,她们成年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此类活动中,这就决定了女性不可避免地成为“合乎逻辑的壁炉守卫者、家庭事务的承担者,同时也是(通常与其他女性合作)缓慢成熟的蹒跚学步者合乎逻辑的监护人和教育者”^[4](P61)]。生育、家居、抚育幼儿等独特的生命体验会使女性更加关注肉体的、物质的、现实的内容,更易为生命个体之间的情感性、关联性所牵绊。而很少被束缚在此类事务中的男性则获得了更大的性别自由,具备了更有可能向社会公共领域拓展自我的性别优势。“自我基本的女性意识表现为与世界的联系”,“女性气质是本质上的生命关注(与生命相关连)”,而“自我基本的男性意识则是分离”,“男性气质是本质上的疏离(与死亡相关连)”^[4](P137,139)]。“存在于生育和分娩的生物性事实及其文化含义之间”^[4](P155)]有一种直接的联系,自然的生理差异决定了两性建构自我的不同方式,进而又导致了两性诸方面的差异,社会性别正是在与生理性别的比照中得到确立的,而这一点正是弗洛伊德学说的应有之义。

由上述分析可知,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虽不像弗洛伊德主张的那么绝对关联,可也不像女权主义者所希望的那么毫无关联。任何标榜着纯然理性的社会建构都有着无法否认的自然基础,真正的“主我”恰恰存在于无法为社会建构所限制的自然与无意识中,并在与社会建构而成的“受我”的分离中保持了相对的自由。否则的话,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都将被被动地全部沦为“对白板的社会化印刻”^[4](P187)],在自认为挣脱了自然束缚的幻影中,又在劫难逃地成为“过度社会化”^[8](P183)]的牺牲品。

生理性别差异是男权制得以建立的“自然基

础”。女权主义者急于借社会建构论以否定生物学差异、否定人的自然限制,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甚至直接否认了生理性别本身,认为完全没有区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必要,二者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旦承认了生理性别差异,就等于承认了男权制的存在合理性一样。而且,女权主义者的许多无异于自我贬低的言论,如对“生育的身体”的厌恶,对哺乳、育儿等生物性母职的痛恨、对“体外怀孕”等“生物技术革命”的热望,将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贬低为“过着一种不事思考的经验性生活”的“心满意足的母牛”等^[11],以及与之相对的一些“正面”言论,如强调女性气质的优越性,对所谓“母权制”社会的热烈畅想等,尽管乍看之下颇有些革命色彩,但终归还是在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中陷入了男权话语的逻辑圈套。

“妇女解放运动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申明她们的性的特殊性,以及要求与此相关的权利,而在于从性的机器内部运作的话语中分离出来。”^[12](P95)]过多地纠缠于性别的社会建构对于女权主义的理论出路而言并无多少好处,或许真正的启示还是来自于“无意识”理论所暗示的那个“双性同体”的性别自由时期。“双性的心灵”^[13](P156)]是“自己的性别特征和异性的生理特征的混合体,是主动和被动的统一体”^[14](P129)],它并不会“特别地或孤立地考虑到性别”^[13](P156)],而是很自然地将两性气质的优势集于一身并为我所用,同时又能借助性别气质中的异性因素实现与异性的良好沟通。谁也无法否认在遭到社会性别规范的强行制约前,内含了“双重性别气质”^[5](P120)]的幼童(尤其是女童)是多么地虎虎有生气,无所谓“主我”与“受我”,甚至也无所谓“自我”与“他者”,神采飞扬地拥抱整个世界。跳出男权制的话语逻辑与思维模式,在尊重性别差异的同时超越性别差异,在勇于自我认同的同时容纳多种认同可能,并在此基础上,真正“唤醒”曾一度拥有的理想人格。“黄金时代”的模糊记忆将有可能为女性解放的道路指出明晰的未来,“妇女运动中最具创造力和活力的因素”^[12](P196)]或许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 [1] [美]凯特·米利特. 性的政治[M]. 钟良明,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2] [美]盖尔·鲁宾. 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A]. 王政,杜芳琴.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3] 圣经(精读本)[M]. 香港: 牧声出版有限公司,2012.
- [4] [英]约翰·麦克因斯. 男性的终结[M]. 黄茜,周丽华,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 [5]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 [6] [美]卡罗尔·帕特曼. 性契约[M]. 李朝晖,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7] [美]琼·W·斯科特. 社会性别: 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A]. 王政,张颖. 男性研究[C].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2.9.
- [8]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 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 埃斯库罗斯悲剧[M]. 王焕生,译.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
- [9]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性学三论[M]. 赵蕾,宋景堂,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53
- [10]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M]. 邵迎生,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4.
- [11] [澳大利亚]薇儿·普鲁姆德. 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M]. 马天杰,李丽丽,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7.3.
- [12] [法]米歇尔·福柯. 性史[M]. 张廷琛,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 [13]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房间[A]. 论小说与小说家[C].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 [14] [美]约瑟芬·多诺万. 女性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 赵育春,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The Phallogentric Interpretation of Freud's Psychoanalysis ——and Revelation to Feminism

SHI Wenfei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00, China)

Abstract: From ideology (phallus worship) to logical thinking (father of fecundity, belonging to patriarchy) two security mechanism (“incest” taboo and “marriage within family” taboo), Freu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can be said with a complete set of patriarchal culture system. The ancient patriarchal culture is resurrected in the coat of modern Anatomy –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its anti – feminist tendency inevitably makes Freud's theory the target of the second wave of feminist movement. But the error in reasoning cannot slander the valu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reud created many rich clinical and revolutionary theories significant for feminist referenc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alectical attitude will be helpful to re – examine and rediscover Freud's theory.

Key words: penis envy theory; gender power; castration complex; incest taboo; social gender; male dominated society; socia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鲁玉玲)